

深沉·自然·朴素

——论赵树理创作的美和生命力

胡凌芝

在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有的人朝思暮想做一个“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挖空心思写一部不朽的“长留世上的文学”，结果适得其反，连人带作品如过眼云烟，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人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写一点东西，无非是想让人们晓得一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普通道理。然而，他的作品却脍炙人口，他自己竟意想不到的成了为人民尊敬的文学家。赵树理就是后者中的一个。

前者“速逝”，后者“长留”，道理何在？

一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①。赵树理所以赢得人民的爱戴，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崇高的荣誉，是因为他为人民写作，并为人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赵树理有一个铁的写作纪律：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他的小说的题材，几乎都取自农村，正是由于描写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独特的成就他被，人们誉为写农村的“铁笔”和“圣手”。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形象的作家或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为数不少，赵树理所以夺得“圣手”称号，乃是因为从开篇《小二黑结婚》到结篇《卖烟叶》，他的铁笔总是伸向风云激荡的农村现实生活，勾勒出这种变革在人们心灵深处所引起的强烈的反响，从而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伟大历史变革时期的农村面貌。如此广泛，如此深入又如此专一地描写现实的农村生活，这在现代小说作家中，确实不多见。在他的那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小说里，总是强劲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展现着变革时期农民群众多采多姿的丰富生活。因此，把他一生的小说创作，看成是形象的农村编年史或农民生活的教科书，一点也不过分。

写农村也非自赵树理始，反映农民生活的也不乏名篇佳作。“五四”时期，鲁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写成的《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世界著名的作品，真实而又深刻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愚昧、破败、落后的农村和农民被压迫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这些作品中的农民群众即便有所反抗，但都免不了带着不同程度的盲目性，所以，结果不是“不准革命”，便是作“示众”的材料，鲁迅写他们的目的，在于暴露旧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三十年代，一些左翼作家如叶紫，蒋光赤等，也有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光采

篇章，诸如《丰收》、《咆哮了的土地》。这些作品正面描写了二三十年代农村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尤其是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更反映了党领导下早期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真实面貌，他们奋力地在“刻划这不平的人世”，预示着被压迫农民必将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完全是另一番样子。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环境不一样了。他接触的是另一天地。文学总是跟着生活走的。赵树理生活并开始他的创作的地区，是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这里的农村正经历着巨大的革命变革，新政权刚开始建立，农民不再是“愚弱的国民”，而是生活的主人，开始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当然，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平静的，旧的反动势力仍在活动着，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还深深地残留在农民的头脑里，束缚着他们的手足，阻碍着他们彻底解放。赵树理真切地反映了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从而突出了新的社会力量的不可战胜。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对青年，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面对封建思想和旧势力，斗争坚决，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深信人民政府定会替他们作主。小芹和小二黑与闰土、祥林嫂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前者对自己的力量自信乐观，后者精神愚昧麻木。两种社会，两种形象；两个时代，两种命运。赵树理把握住这一时代特征，敏锐地觉察到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的力量，而加以集中和典型化，合理地、有说服力地展示了这一变动时期的生活侧面。《小二黑结婚》一出世，便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显出它的不朽的生命力。彭德怀同志为它题词，说：“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继《小二黑结婚》之后，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的发表，一时间成了解放区文艺界的一桩大事。不论在开拓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人物刻划的典型性多样性以及表现形式的新颖独创方面，《李有才板话》都比《小二黑结婚》进了一步。它被文艺界公认为是一篇杰作，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李有才板话》写于1943年10月，反映了抗战时期解放区农村的斗争生活。抗战时期，就全国范围看，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阶级矛盾则降到次要的地位。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区，阶级矛盾仍然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赵树理通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感受和深切体验，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矛盾特点，他没有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的锐利的眼光察觉到在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某些地区的农村正在隐蔽地进行着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李有才板话》生动真切地描写了以李有才为代表的小字辈、老字辈贫苦农民与地主阎恒元之间，围绕减租减息和改选村政权所展开的一场微妙而又激烈的斗争，由于党的干部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路线，最终农民掌握了村政权，斗争获得了胜利。《李有才板话》的发表，使群众喜爱，干部欢迎，文艺专门家陶醉。这篇作品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中，都曾被当作形象化的教材，列为干部整风的读物。

1945年间，赵树理酝酿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说，写它是为了揭露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的种种剥削压迫，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由于作品容量较大和当时环境的影响，等到小说完成时，上党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未能起到动员人民参战的“速效”作用。但是，他留下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村历史变革的画面，是永远具有价值的。

赵树理的“配合党的工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创作指导思想，确立于延安“整风”时期。建国以后，这一认识则变得更为自觉了。只要我们认真体会深入剖析一下他解放后创作的那

些小说，从《登记》到《锻炼锻炼》，再到《卖烟叶》，那一篇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的富有意义的题材，那一篇不是与党的农村工作息息相关，那一篇不是揭示了我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所遇到的必须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要是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作者比较侧重于探讨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所引起的，农民精神世界的“变革”，较多的着眼于揭示农民心灵深处的奥秘。这是因为作者在长期而深入的农村生活中，切实而深刻地理解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以，赵树理的作品，继续焕发着不可取代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赵树理创作的“革命功利主义”是很有意义的。赵树理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一个极为严格的要求。他时时考虑他的服务的主要对象——农民对文学的要求；他要使自己的作品有助于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能使人民群众感奋起来。赵树理的创作实践雄辩地说明，要艺术地实现这一要求，而不是图解党的政策，需要经过多么艰苦的努力。

赵树理象一棵参天拔地的大树，立于我国现代作家之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作品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凝聚着一股顽强不屈、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由于赵树理深深扎根于群众生活的土壤之中，吸收着丰富的养料，所以，他能及时地感受着群众斗争生活的脉搏，他也觉察到萌动并滋生着的方兴未艾的新生事物，当然，也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他以鲜明的爱憎态度，为推动历史前进但暂时还显得幼弱的新人新事，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对阻碍和摧残新生事物的人和事，则批评揭露，毫不留情。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劝其所劝，正是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赵树理如何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实际生活中，他听到过这么一件事，一对男女因自由恋爱，遭到封建势力的阻挠，结果男的被活活打死了；他发现了太行山区有些村政权被流氓分子把持，这些人打着新政权的旗号，干的却是压迫老实农民的坏事；他也看到了农民群众中还有着象三仙姑、二诸葛那样被封建迷信、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深深禁锢着，以至于去破坏自己儿女幸福的人。他感到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会影响农民的抗日的积极性和新生政权的威望，而这些勇于追求新的生活、新的理想的青年则应有光明的前途，因为人民的政权终究会给他们主持正义的。于是他及时地将这个“问题”写进了小说，成了《小二黑结婚》现在这个样子。作品让人明理，又给人希望；忠于现实，又不拘泥于具体事实。这是赵树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精髓，也是他创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

赵树理作品主题的形成不同一般，他自有他的道理。他说他是在工作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②。赵树理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一方面表明赵树理严谨的创作态度，他不图轻松，不找捷径，具有艰难险阻敢登攀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类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又往往是生活中带有关键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如高尔基所说：“艺术作品的目的是充分而鲜明地描写事实里面所隐藏的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③。但这需要作家的胆识和勇气，需要作家的眼力和功力，赵树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看到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中有些人习惯地误认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他便写了《地板》；写《锻炼锻炼》也

因为一些中农出身的干部有和事佬思想，压制新生力量，迁就落后意识；有感于“五风”的盛行，他便写了《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热情赞扬了自觉的劳动态度和实干精神。这些“问题”小说不仅提出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给人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启示。因此，读了他的作品，总使人感到亲切。这就是赵树理的创作所独具的教育意义和美学价值。因此，他的作品不管是文学的行家或普通的农民，都爱看爱读。

赵树理小说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刻划人物上，他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且又善于观察社会变动在人们灵魂深处所引起的波澜，惟妙惟肖地加以刻划和表现。在他的作品的人物画廊中，有象李有才、老杨、小二黑、铁锁、陈秉正、潘永福那样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拥护并推进历史变革的带头人，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他们总是那么坚定乐观、积极勇敢、苦干实干、破浪前进。这些人物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光彩照人。赵树理不仅热情真挚地讴歌了生活中的强者——具有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的先进农民，同时，他也真实地描写了生活激流中的弱者，背着囚徒的精神负担，跟不上时代前进脚步的落后的农民。作者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们胆小怕事的心理，受骗上当的遭遇，相信天命的愚昧，贪图微利的自私。在生活途程中，他们步履艰难，犹豫观望，一步一回头。求助于卜卦过日子的二诸葛，以装神弄鬼唬弄人为业的三仙姑，“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的老秦，经不起鬻衣炮弹袭击的陈小元等，这些形象生动逼真，令人难忘。他们的步子总是“脱了一拍”，这是因为他们头脑中还保留着一个旧的“王国”。赵树理非常真切地、有说服力地展示了这类人物怎样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陋习和弱点在自己身上的影响，进行着斗争的艰苦历程，描写他（她）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刺痛他（她）们一下，期望农村中多一些李有才、老杨式的人物、少一些陈小元、三仙姑、章工作员这样的人。既把握生活的本质、主流，又不回避、粉饰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落后面，阴暗面，一切依据生活的本来面目，这是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又一特色。

三

赵树理的作品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这除了它在思想内容上与人民、时代有着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的新颖独创，真正做到了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他“化”得那么自然，那么到家，叫人不能不佩服他对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所作的成功努力。读赵树理的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它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庞大的结构，没有矫揉造作的语言，与他作品的内容朴素、实在相一致，一切都显得朴朴实实，明明白白。

赵树理好采用讲故事的表达方式，读他的作品，如听人讲故事似的，有头有尾，慢慢道来，引人入胜。如《李有才板话》，第一章《书名的来历》，开门见山，从李有才讲起，“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接着讲他的身世，“家业”，又讲到村上的小字辈，再讲到他的快板，然后再说到“板人”、“板话”。从头讲来，细作交待，故事味很浓。以讲故事的方式，把情节彻底“故事”化，这是他一贯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的就干脆说明，讲一个故事。如《表明态度》这样说：“这是我一九五一年夏天在山西长治专区草拟的一个电影故事，后来因故搁置，今天看来也还可以当个故事看看，所以把它拿出来了”。作品就是这么开的头。在《卖烟叶》里，索性把它点明：“我写的东西，一向被列入

小说里，但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现在既然出现了‘讲故事’这种文娱活动形式，就应该更向这方面努力了。闲话少说，让我先写一个卖烟叶的故事试试灵不灵”。他的小说，几乎都是“说故事”，所以总是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从不给人有纷乱繁杂之感。赵树理所以常用讲故事的形式，是因为他立志要给农民提供精神食粮，用他的话说，他的小说是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①。因此，他就要照顾到农民的欣赏习惯，考虑到为农民所能接受的传统的艺术形式，“讲故事”是最大众化了。赵树理的讲故事，不是简单的形式上效法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他有所革新和创造。对中国民间艺术的传统形式，不是盲目照搬，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他清醒地看到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他有所吸收，有所扬弃，有所融合。《李有才板话》显然吸取了我国民族章回小说的特点，共分十章，每章一小题，但作者不拘泥于这种程式和套套，他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既有大故事，也有小故事；事情从头说起，下面接着往上说，说到一段，嘎然而止，保留扣子；叙述为主，带出描写；有才快板，贯串全书。既有传统文艺成分的点染，又不是原来的老章回体了。这正如鲁迅说的：“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新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②。赵树理学习旧形式，又不拘泥于旧形式，而是有所删除，有所增益，加以变革，一切为表达内容服务，新颖独创，面向大众，结果成了“赵树理体”了。

所谓“赵树理体”，当然与他的语言风格也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做到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也从他的语言表现出来。他的语言是那么朴素自然，又那么富有光彩。他要求自己的语言是“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凡是群众口头不常用的词句，他尽量避免用，要求通俗易懂，这些来自人民群众的口语，又是经过充分提炼过的，绝不是一般的方言土语。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语言大众化，通俗化，不只“化”在人物本身的语言上，不是“化”一部分，留一部分，而是“化”在他的整个艺术手段中，即使叙述描写，也同样作到通俗化，用的是活的群众语言。他“化”出了通篇作品和谐一致的语言风格，所以，他真称得上是一位语言大师。

按照旧的传统的眼光，以为通俗的便不会是高级的，“曲高和寡”嘛！那末，象赵树理那样“和多”的作品，谅来不会是“高曲”了，其实，这是浅薄之见。高尔基说得好：“真正的美，正如真正的智慧一样，是非常朴素的，而且是人人理解的”^③。赵树理作品的闪光之处，就在于它的“朴素”，在于它“人人都能理解”。何况他的作品不仅通俗，而且极其精练，极其纯净，是相当精采的文学语言。赵树理作品的语言，朴素而不平淡，上口而回味无穷，这不是朴素的美又是什么？文学语言达此境界，谈何容易，是作者辛勤劳动、苦心锤炼的结果，黑格尔就这么说过：“既简单而又美这个理想的优点毋宁说是辛勤的结果，要经过多方面的转化作用，把繁芜的，驳杂的，混乱的，过分的，臃肿的因素一齐去掉，还要使这种胜利不露一丝辛苦经营的痕迹，然后美才自由自在地，不受阻挠地，仿佛天衣无缝地涌现出来”^④。赵树理作品的语言就是经过充分锤炼的，才达到如此高度的成就，真正体现出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注〕

①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 ②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代序
③高尔基：《与青年作家谈话》《文学论文选》294页 ④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 ⑤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且介亭杂文》《全集》第6卷20页 ⑥高尔基：《谈谈应该怎样为《我们的成就》杂志写文章》《论文学》续集248页
⑦黑格尔：《序论》《美学》第3卷上册第5页